

博克爾著
胡肇椿譯

英國文化史

中冊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H. T. Buckle 著
胡肇椿 譯

中山文庫
英國文化史
中冊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 重慶初版

(94.04.4 B)

中山英國文化史 中冊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定價國幣陸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江 T Buckle

譯述者 胡肇椿

編輯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概述

- 第一章 自十六世紀中葉至路易十四秉政間之法國思想史……………一
- 第二章 保護精神史及其在英法兩國之比較……………五三
- 第三章 法國保護精神之蔚盛亦即表明夫隆德戰爭之失敗及夫隆德戰爭與同時代英國叛亂之比較……………七四
- 第四章 保護精神爲路易十四引用於文學智識階級及統治階級連合所產生的影響底考察……………九〇
- 第五章 路易十四之死保護精神之反動及法國革命之整備……………一一〇
- 第六章 自十六世紀之末葉至十八世紀之末葉之法國歷史文學……………一三五
- 第七章 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法國革命之近因……………一六七
- 第八章 由第五世紀至第十九世紀中葉之西班牙思想史概略……………一二二

英國文化史

概述

第一章

——自十六世紀中葉至路易十四秉政間之法國思想史——

因爲考慮的英國思想這些偉大的變遷不禁使我旁涉於其他的討論，這種討論不特與上冊通論底論旨發生關係，且爲事實上應有之認識。關於這方面——與其他方面初無二致——在社會組織之研究及人體之研究間有一明瞭的類似點。因此，我們曾發現，欲求得疾病之原理誠不如先求康健原理之爲愈；而所有完美的病理學底基礎亦必先由觀察普通之生活機能而得，外此並無特殊方法。我相信我們能同樣地發現，欲求偉大的社會之真理則必須先研究社會之能否按其定律而進展，及統治當局之能否減少與其時代精神之敵對態度等（註一）情狀而定。職此之故，欲明瞭法國的情勢必須先以英國爲借鑒。欲明瞭前一國之弊病之如何由於其愚昧之統治者之誇耀所激怒而成，則必需先明瞭後一國之所以健全是如何因少受干涉及多得自由以繼續其自然之進步而來。故我們由研究英國思想之正常情形而得之啓悟頗能使我們應付自如地將我們底原則應用於法國社會之特殊情狀，此種情狀之作用曾使最寶貴文化事業在十八世紀末葉時陷於危險。

在法國，一段很長的史實——我此後將敘說的——在很早的一個時期即已給與教士以一種權力較英國教士所擁有者爲尤大。這種情形底結果在某一個時期是確實有利益的，因爲教會可以因而限制一個野蠻時代底不

法，並予弱者與被壓迫者以保障。但當法國人的智識進步了，那些曾努力遏抑其野蠻情緒之宗教權威即開始暴烈地抑止他們底天才者而阻礙其發展。這個同樣的教會權力在愚昧的時代是一種專有的利益，而在一個開明的時代却變爲一嚴重的禍害了。這事底證明不久便顯露了。因爲當宗教改革爆發時英國之教會已非常微弱，以致不禁一擊即幾陷全部於傾覆；其經濟收入爲英王所攫取（註二），其官缺於權力及財富銳激地減削以後，便轉落於新的人物底身上，這些人因任期之不確定，教義之時代革新，便失去了久經支持這種教會職業的規例底保障。這一點，我們已經看到，是一個不斷的進歩底開端，在這個進歩中底每一階級，宗教的精神總失了他相當的勢力。反過來，在法國教士是這樣地有權力，以至他們能阻止宗教改革而爲他們自己保存英國教友所無法以獲得的那些獨享的利益。

這是法國及英國文化第二種明顯分歧的開始（註三），當然其分歧之起源是很早的，不過現在才初次產生了顯著的結果。這兩個國家在初期都會大受教會底恩澤，教會是常表示其預備保護人民而反對君王及貴族底壓迫的。但當社會進步了，在這兩個國家裏都發生一種自衛的功能；當十六世紀早期，或竟可說在十五世紀時，已很迫切需要減少宗教的權威，這種權威因武斷了人們底意見曾阻礙了他們智識底進步。職此之故，新教非但不是它敵人所稱爲的偶然因素底作用，却完全是一正常的運動，是歐洲思想需要之合法的表现。當然，宗教改革之成功並非由於要肅清教會的願望，乃是由於要減輕其壓力的願望；而且可以大概地說，這種改革凡屬文明國家大都已採納，除非在有些國家內，其以前的忠實已在民間及統治者間增加了教會團體底勢力。不幸法國就是這樣的情形，教士非但壓倒新教徒而得到勝利，且因擊敗這種危險的敵對而反於某一時期獲得新的權力。

所有這種情形底結果，即在法國，凡事都較英國含有神學的意味。在英國，則宗教精神十六世紀中葉已呈消沉之氣以至國外的智識界人亦震驚於這種特點（註四）。這個國家，在十字軍的時候，曾犧牲無數生命以冀樹植基督教之標準於亞洲中心者（註五）現在對於其本國君主底宗教亦幾置之漠然。亨利八世曾以其個人的意志整理國家底教條和固定教會底儀式書，如果人民對於宗教是熱心的，那他對於這一點必辦不到；因爲他沒有方法

可以強迫人民服從；他沒有常備軍；即使他自己個人的羽林軍實力亦感不足，恐不禁倫敦戰士式之藝徒暴動之一擊（註六）。他死以後，愛德華（Edward）踐祚，因為他是一個新教徒不再繼續他父親的工作；數年以後；瑪利（Mary）繼位，因為她是一個羅馬教女皇，於是也就停止了她兄弟底工作；至她之繼承者乃是伊利莎白，在她統治之下，另一大變遷又復動搖了這已建立的信仰（註七）。人民底冷淡使這些大的變遷不受絲毫嚴重的危機而得以成功（註八）。可是在法國則不然，僅以宗教作幌子瞬息即可招集數千人以赴戰場。在英國，我們底內戰完全與宗教無關的；大都是為更換朝代，或要求增加自由而戰。但是法國在十六世紀時慘絕人寰的那些尤為可怖的戰爭乃無一不是在基督教名義之下領導着的，就是幾個大族的政治鬥爭亦被捲入於舊教及新教之殊死戰的漩渦中了。

這種差異點在兩國底思想上所產生的影響是很明顯的。英國人因集中其能力於偉大的宗教以外的事情，故在十六世紀末葉能產生一種永不磨滅的文學。但法國人在同一期間內，却無隻字之傳，這在文學上之陵夷，寧非今日歐洲之損失？抑有甚者，法國底文化植基較為悠久，國家之物質資源開發亦早，其地理上之地位使其成為歐洲思想之中心；且在其文學已有相當成熟之某一時期，我們底祖宗還祇是一羣粗鄙的野蠻人呢。

簡單地說來，就是以上是無數例證之一，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國家能在其宗教權力鼎盛的時候，一躍而躋於卓越的地位的。因為宗教階級佔優勢，則必然使該等階級所喜研究之題材亦佔優勢。凡當宗教職業非常佔勢力的時候，宗教文學將異常豐富，而所謂世俗的文學也必意外地衰微。因此，法國人底思想以幾全為宗教爭論所佔據的原故，無暇再從事於英國正開始着手的那些偉大的研究（註九）；而且我們立刻可以看到，在法國和英國思想進步之間，幾存有整個世紀之間隔，就因在他們懷疑主義之進步間亦存有同樣的間隔。關於神學方面的文學，當然很迅速地增加起來（註一〇）；但直至十七世紀法國才產生偉大的世俗文學，其於英國則早已於十六世紀末開幕以前出現了。

這就是法國教會權力之伸延超於社會情勢所需要之時期的一個自然的結果。但這不過是智識方面的結果而

已，至於道德及體質方面的結果則尤爲嚴重。當人們底思想爲宗教爭鬥所激動時，決難希冀其維持仁愛之格言，此種格言，神學的信徒是常視如異徑的。當新教徒及舊教徒（註一）彼此相殺戮時，任何一教派都不會容納其對敵者底意見。在十六世紀之際，兩教派間固常訂有條約；但不久又趨破裂（註二）；而且除伊·霍彼得（I. Hospital）以外，宗教自由這個簡單的觀念似乎未曾印入當代的任何政治家底腦中。他曾介紹過這個觀念，但以其超絕的能力及無瑕的正直都未能奮起反對流行的偏見，因此以後他就退守閒居而未會完成他任何高尚的策劃。

在法國史中，這個時期底主要事件確很令人感覺到表現着神學精神底優勢的痛苦。它表現在普遍之決心，要將政治的活動附屬於宗教意見之下。它表現在翁布瓦斯之亂（The Conspiracy of Amboise）及諾西會議（The Conference of Poissy）中；它更表現於迷信所必然發生的那些叛亂罪惡中，如瓦西（Vassy）及聖·巴托羅繆（St. Bartholomew）之殺害，及鮑屈洛（Poltrot）之殺害伊斯（Iuise）、克雷門特（Clement）之弑亨利三世。這些是宗教迷信精神底自然的結果。它們是得權時即置異己者於死地的那種精神的結果；而這種精神，在現在失勢時，還繼續武斷那些最神祕的問題，干預人心最神聖的原理，及以可憐的迷信蒙蔽那些沒有人敢認然着手的那莊嚴的問題，因爲這些問題底觀點可以因人而異，因爲這些問題橫梗於隔離在有限與無限之不可知之區域中，又因爲這些問題是人和上帝間底祕密與約束。

這些愁慘的日子在普通情勢中將在法國延長至多久，恐怕是我們現在無法解答的一個問題；雖然即經驗智識之進步，按已指出之程序而言，無疑地必亦足以拯救上國於式微的地位。尙幸發生了我人應自滿於稱爲偶然之遭遇，而其實乃一重大變遷之開端的一件事。一五八九年，亨利四世登法國之王座。這個遠較十六世紀（註一三）以來的列宗爲英明的偉大的王輕視他前人所視爲非常重要的那些神學爭論。以前法國底君王每爲教會底保護人所固有的虔敬所激動，會盡施其威權以維持那神聖職業的利益。佛蘭西斯一世（Francis I.）說，如果他底右手是一異教徒，那麼就把它砍斷了也不稍顧惜。亨利二世他更熱心了，會命令審判官吏進行反對新教，且

公開地宣布他將「以消滅異教徒爲其主要之事業」(註一四)。查理士九世企圖於舉行聖·巴托羅繆祭典時一網打盡新教徒以拯救教會。亨利三世曾允諾「犧牲其性命以反對異教」；因爲他說：「他認爲死於傾覆異教誠不愧爲無上光榮的死。」(註一五)

這些就是在十六世紀時歐洲最古的君主專制國底首腦所表示的意見。可是亨利四世底果斷的慧識並不予這些感覺以絲毫的同情。爲適應他當時的政潮起見，他曾兩次改變宗教；當他發現宗教之改變能確定其國家之穩定時，他毫不猶豫地竟改換他底宗教以至第三次。他既對於自己底信條表示如此冷淡，當然不能對於他人民底信條表示多大的迷信。於是我們發現自基督教成爲法國國教以來，他是政府首次公布宗教自由法令底起草人。祇在他莊嚴地棄絕新教後之五年，他頒布那著名的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註一六)，這以一個舊政府而賜與異教徒以公平的享有公民及宗教的權利實爲空前之舉。這也無疑是法國文化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以這件事底本身而言，不過是這個王底開明主義底一個證據；但當我們看到它普遍的成功，及其後宗教戰爭之停止，我們即不能觀察到這實是人民自身所參與之大運動中的一部分。凡首肯我所銳志建立之原理的人，當會想到這宗教自由底偉大步驟是附有着懷疑主義的精神的，沒有這種精神即無所謂宗教自由了。事實確是如此，很容易可以拿法國開始踏入十六世紀末葉時之過渡情狀底研究來證明的。

拉培雷(Rabelais)底著作固常被視爲法國語文中之宗教懷疑主義底代表作。但我對於這個名人底著作有了充分的認識以後，總覺得盛名難副。他確對於教士表示極大的不敬，且利用機會充分地嘲笑他們。可是他所攻擊的常是他們底惡德，而不是這些惡德所由來的那狹隘而不寬恕的精神。他沒有在一個例中表顯任何與懷疑主義相一致的事物(註一七)，他也似乎沒有注意到，法國教士之可恥的生活費實乃一種制度之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制度雖屬腐敗，卻仍常顯示著力量與生氣。的確，他所享得的物望，其本身已是一種確定的重要事實；因凡明瞭十六世紀早期時法國人之情狀者，沒有能相信這樣浸漬於迷信的一種人民會歡迎常時攻擊迷信的一個家。

但經驗底擴充，及因以增廣的智識，正爲法國思想底偉大變遷開一途徑。剛在英國所發生的程序，現在開始在法國進行；而在兩國中，事情的順序恰是相同的。懷疑的精神以前祇限於隅然的孤獨思想家，現在漸漸呈現一較開展的方式：起初在國家文學中找到了吐瀉的機會，漸則影響到實行政治家底行爲。在法國懷疑主義及宗教自由之間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點，非但爲使我人推論這種關係之必然常時存在的那些普通論據所證明，且亦因南特敕令宣布以前的幾年，出現一用法文寫作的懷疑主義者的一件事而確定。蒙坦（Montaigne）底論文集是在一五八八年出版的（註一八），這非但在法國文學且在法國底文化中造成了一個時期。撇開這些個人底特點不談，——這並不如普通所設想的這樣重要——我們將發覺拉培雷與蒙坦之不同點即一五四五年（註一九）及一五八八年之不同點底測量，有如我所闡明的呼克爾與朱埃爾及呼克爾與契林渥斯間的關係一樣。因統治所有這些關係的定律即等於進步的懷疑主義底定律。拉培雷之對於神學的擁護者的關係亦與蒙坦之對於神學本身之關係同。拉培雷之著作不過是直接對付教士者；而蒙坦底著作却直接反對教士所由產生的那制度底本身（註二〇）。在外表上，蒙坦似和常人無二致，以普通的文字表現着他自然的思想，但內心却蘊藏着高尚及勇往的研究精神。雖然他缺乏最高天才者的那種宏富的理解力，可是他却含有其他性質爲偉大的思想家所不可少者。他非常審慎，但亦非常勇敢。他是審慎的，因他不因前人底遺訓而致相信怪誕的東西；他是勇敢，因他絕不畏懼專斷的愚昧者，——這些人是專喜譴責因智識而懷疑的人的。——這些特殊點在任何一世紀都會使蒙坦成爲一個重要的人：於是在十六世紀他便成爲要人了。同時，他那種流麗而富於情趣的風格（註二）增加他著作底銷售力，而使其敢於公諸社會的意見，得以普遍。

這是降至十六世紀末葉時公開在法國顯現的那種懷疑主義底第一次公開的宣示。在三世紀中，這種精神以繼續增長的活動繼續它底途程而發展爲與英國所遭遇者相同的情態。這個偉大程序底所有階級，不必都加以敘述；我現在所要研討的不過是其中之最重要者而已。

蒙坦底論文發表以後沒有幾年，法國復有他書出版，這部著作在現在讀者很少，但在十七世紀時卻負有重

名。這就是沙龍(Charron)底有名的智慧論(Treatise on Wisdom)。在這部著作中，我們第一次發現不因神學底幫助而以現代語來建立一道德學系統的企圖。使這本書在有幾方面較蒙坦所著者尤為可怖之處乃在其文筆之嚴肅。沙龍顯然深印着他所負使命之重大而他所以能尊榮地別於同時代之著作家者，乃在他文字及情感之特殊的純潔性。他底著作幾乎是當代最動人而雅馴的文筆。雖然他曾由蒙坦裏假借無數的例證(註二)，但他能留意地避免其他情趣的作家所常有的越距尖刻的地方。除此以外，沙龍底著作呈現出一種有系統的完備，永不會不引人注意。在創作力方面，有些地方他是較遜於蒙坦；但他幸而生於蒙坦之後而且無疑他已達到一個崇高的地位為蒙坦所不能至者。以他在智識上之登峯造極的地位，他勇敢地嘗試去列舉智慧底原理及此等原理作用時的條件。在他這樣建立的設計中，他完全刪略了神學方面的武斷之說；而且毫不隱匿地怒罵一般人所普遍接受的結論。他警惕他底國人，他們底宗教不過是他們出身及教育底偶然的結果，如果他們生長在一回教國中，則他們將是回教底堅誠的信仰者，有如他們信仰基督教一樣。因為這個原故，他堅持他們以教義之異同來困擾他們自己之可笑，因他看到，這種異同乃是他們無法支配的那些環境底結果。他又說這些不同的宗教，都每每宣布它們自己底一種為真正的宗教；且皆各自基於超自然的假託，如神祕、奇蹟及預言家等等。這都是人們忘記他們自己是這種信仰的奴隸，而這種信仰乃是所有真實智識之極大障礙，——惟有採納偉大而廣闊的見解方易破除——，以視所有國家無不同樣熱烈地堅持其所由陶育的教義誠可知也(註三)。沙龍說，如果我們深加觀察，則我們將看到，每種大的宗教都是建立於其前一宗教之上的。即如，猶太人底宗教乃是基於埃及人底宗教；基督教是猶太教底結果；而由後二者則自然地產生了回教。故這個偉大的作家又說，我們應超乎一切彼此仇視的教派底託辭之上，而不為未來刑罰之恐懼所侵襲，不為未來快樂之希望所誘惑，惟一意滿足於能履行生活之責任的實際的宗教；而且不為任何特殊教條所支配，我們將努力使靈魂歸附於其本身，而因其本身默思之努力以讚美造物——萬物之最高因素——不可言喻之偉大。

這些就是在一六〇一年第一次用他們自己底文字寫作而呈於法國人民之前的意見(註二四)。它們所代表的懷

疑及入世的精神繼續增加；當十七世紀邁步前進時，宗教狂底衰退不惟不祇限於幾個孤獨的思想家，且在平常的政治家中亦漸成爲普通的事情（註二五）。那些教士感覺這種危險，想政府出來阻止這種研究底進步（註二六）；而教皇本人，在對於亨利作一正式的規勸時，曾懇求亨利以迫害異教徒來補救這種禍殃，他以爲這許多禍害都是由於異教徒而來的。但是王堅決拒絕他這種要求。他看到，如果他能平均這兩教派底力量使之彼此反對以減弱教會的權力則將產生極大的利益；因此他雖然是個舊教徒，他底政策却反左袒較弱一教黨的新教徒。他賜給許多金錢來維持他們底牧師及修理他們底教堂；他放逐他們最危險的敵人耶穌會徒（Jesuits）（註二七）；而且他還常常有兩個改革教會的代表，他們底職務就是報告給他一切違犯他所宣布的偏袒他們宗教底敕令底事情。

因此在法國和在英國一樣，宗教自由是總在懷疑主義之後；從這懷疑主義中即產生亨利四世底合乎人道及開明的政策。不幸這個主動這些事情的偉大的君主成爲他曾努力抑制的宗教狂的犧牲者；但他死後所發生的情狀表示他底死對於那時代是怎樣一個大的激動。

在一六一〇年，亨利四世被弑以後，政府即入於王后之手，她是在她兒子路易十三未成年時主政的。當時她思想底趨勢很明顯，因她雖然是一個軟弱而迷信的婦人，却不敢施行一世紀以前視爲宗教真誠之必然證明的宗教迫害。當然這不是普通能力的一種運動，能在十七世紀早期強迫一個美提契家（House of Medici）底公主，——一個於牧師環繞中育成而慣於以牧師底讚美爲最高的人世間的目的的這樣一個愚闇及迷信的舊教徒——去實施宗教自由。

可是這倒是確實情形。這個女后保留亨利四世所用的大臣，且宣布她於事事都將仿效亨利四世。她第一個公布的法令即宣布南特敕令必須絲毫不受破壞地被保存着；因爲她說，「經驗告訴我們底前人，暴力非但不能誘人回返於舊教教會，且更令人踴躍不前。」他對於這一點是非常焦慮，以致當一六一四年路易在名義上成年以後，他政府底第一道諭旨即再復確定南特敕令。一六一五年。她使這個王——他仍在她保護之下——發出一宣言，將以前所有偏袒新教徒的設施公開地確定了。以同一用意，她在一六一一年擬升擢著名的得圖爲國會之議

長；以後正式宣布他是異教徒，教皇方得以阻撓他認爲不虔敬的計劃。

這種種事情底轉變並不是不引起僧侶團袒護者底驚恐。最熱烈的那些教士嘩然非難這個女后底政策；有個偉大的歷史家會說，在路易十三時代，當這種驚恐爲宗教權力底活動侵略所分佈於歐洲的時候，法國是第一個國家膽敢反對他們。聖使公開地對后埋怨她偏袒異教徒的行爲；並且他焦急地希望壓止那重大玷污真正信仰者底良心的新教徒的著作。但這些及其他同樣的意見，不復若以前的受人敬聽；國家底事情繼續以純粹的政治眼光來主持，這是亨利四世底政策所公然特爲基礎的。

這就是法國政府當時的政策；這個政府在沒有多少年以前，還以爲一個君主底最大責任，乃在刑罰異教徒及消滅異教。如今這種繼續的改進不過乃一般智力進展的結果是很顯然的，非但可以從它成功方面看出來，且可從攝政的王后及這個王底性質方面顯出來。凡曾讀當代之傳記者，沒有能否認瑪利·得·美提契 (*Mary de Medicis*) 及路易十三和他們以前的王一樣地迷信；因此，很顯然，這種對於神學偏見的忽略，並非由於他們自己個人才具，乃是由於國家不絕進步着的智識及時代的壓力，這種時代的壓力以其進步之速，竟推動着那些自信爲時代之統治者。

但這些謀慮雖然富有壓力，却祇能稍微減削當時獻身於公共事業台上一個著名的人底功績。在路易十三最後十八年中，法國完全爲黎塞留所統治，他是極少數以其個人的人格影響於他們國家命運的政治家之一。這個偉大的統治者在政治手段的智識方面而言恐怕未有人能超過他的，除了在我們的時代會擾亂歐洲的那神奇的天才者外。但在一重要的觀點上，黎塞留却超越於拿破崙。拿破崙底一生是注全力於壓迫人類底自由；而他不可匹敵的才能却盡消耗於掙扎以反對一個偉大時代底趨勢，黎塞留也是一個專制者；但他底專制採取一較高尙的途向。他對於他自己那時代的精神表現拿破崙所永未有的公正的尊重。在某一大的目的上，當然他是失敗的。他擬毀壞法國貴族社會底權力的企圖是完全失敗了（註二八）；因爲經過久長的歷史，這個驕傲階級底威權已深深種根於一般人底腦中，必須另一世紀底努力才足以拔除其舊有的勢力。但雖然黎塞留不能減少法國貴族在

社會及道德方面的勢力，他却剝奪他們底政治權利；他嚴厲地懲罰他們底罪惡，至少在一時期中曾遏止了他們以前的放肆（註二九）。無奈這個有才能的政治家底影響都因為沒有當時時代底擁護以至甚為微弱，這些抑制的舉動邁往雖極猛烈，還不足以產生永久的結果。他死以後。法國底貴族——我們現在將看到的——很快地就恢復了原有的勢力；而且在夫隆德（Fronde）之戰爭中將這個偉大的爭鬥降而為世族對敵的競爭。直至十八世紀末葉時，法國方最後從那權力階級底誇張勢力裏解救了出來，這個階級底自私心曾滯留人民於奴隸的地位——因遠久的影響，他們現在還未能恢復過來——而久長地阻礙了文化底進步。

雖然黎塞留在這方面失敗了，但他在其他方面却得到顯著的成功。這因為他廣大而富於理解力的見解和我所敘述的懷疑傾向是相和合的原故。因為這個顯著的人，雖然是一個主教和教皇內閣關員，可是從未容許他職業上的權利使他拋棄國家更高的權利。他知道——那常常被忘却的——人民底統治者必須完全以政治標準來計劃事情，不應注意任何教派底要求，或任何意見底傳佈，除非有關於人類現在或實際的幸福。結果，在他主政的時候，我們看見最高權威為一個不設法增加宗教階級底權利的牧師所指揮的奇異的景象。他確是對待他們有如當時所稱為無可比擬的嚴厲。聽懺悔之御用牧師因職務之重要常受到相當的敬視；他們常被視為無瑕的虔誠的人；他們一向佔有巨大的勢力，即使最有權力的政治家也因他們地位之高崇應對他們表示敬重（註三〇）。但黎塞留對於他自己的職業上的技巧深為明瞭，以至不會對於君主之良心底保持者表示多大的尊敬。科桑（Causin），路易十三底聽懺悔牧師，似乎也依着他底前人的榜樣擬將他自己的政治觀念灌輸於懺悔的王底腦中（註三一）。黎塞留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就撤了他底職，並且還放逐了他；因他很輕鄙地說，「這個小神父科桑」不應干預政府的事，因為「他本來是那些清白的宗教生活中培植出來的一人」。繼科桑的是有名望的賽爾蒙（Sirmond）；但黎塞留等他嚴正地承諾永不干預國事後，才讓這個新的聽懺悔之牧師開始他底職務。

在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時機，黎塞留表示着同樣的精神。法國教士當時佔有巨大的財富；他們享受私自征稅的權利，但很吝嗇地不肯納付他們認為不需要的國家賦稅。為反對新教徒起見，他們到很起勁地集款助戰，

因爲他們相信消滅異教是他們底責任。但他們覺得以稅收廢費於非宗教的事業是沒有理由的；他們以保護宗教經費者自居而以他們祖先之虔誠所集得之財富落於教外之政治家之手中，爲污瀆神靈的一件事。黎塞留，對於這些猶疑的態度認爲利己者之狡計，於是他便對於教士與國家之關係，另具一種見解。他非但不以教會之利益爲高於國家底利益，且以「國家之名譽爲最重要」定爲政策之金科玉律。他對於這個原則是這樣地毅然而無所畏懼地執行，於是在曼特 (Mantes) 地方招集一次教士大會，強迫他們捐助政府六百萬法郎之巨數；當有幾個最高大主教對於此舉表示不滿時，他簡直不顧毅然執行，且出乎教會意料之外地放逐四個主教及圖盧斯 (Toulouse) 與松斯 (Sens) 兩個地方各兩個大主教。

假若上述的事情發生於五十年前，則對於膽敢出此之大臣必遭受致命之傷。而黎塞留於實行是等政策時，却爲正欲輕視其古代教師之時代精神所襄助。因此種普遍之趨向現非惟於文學及政治上，且於普通法庭之判決案件上漸呈明顯之態度。聖使憤怒地怨責法國審判官吏對於教會中人所表顯之仇敵行爲；他說，和其他許多可恥的事情一樣，有幾個教士在宗教人格方面未受任何指摘而先被縊死。在其他時候，一般底底增長增高的輕鄙心更趨激烈。波爾多 (Bordeaux) 大主教蘇迪斯 (Soudis) 曾兩次被辱打；第一次被得埃培納公爵 (Duc d'Epemon) 後被維特累 (Maréchal de Vitry) 所毆。黎塞留一向都用嚴厲手段對付貴族的，故似乎亦不急於懲辦這種可驚的暴行。這個大主教非但不得人底同情，且數年以後被黎塞留強制命令其退駐他原來之主教管轄區內；但他對於這種情勢非常驚懼，於是逃逸至卡蓬特拉斯 (Carpentras) 受庇於教皇。這是在一六四一年發生的事，九年以前教會曾遭遇到更大的污辱。因在一六三二年蘭圭多克 (Languedoc) 地方曾發生了嚴重擾亂，黎塞留並不畏懼地撤辦幾個主教及攫取其他幾個主教底教堂財產以應付困難(註三三)。

教士底忿怒是很容易可以猜想到的。這種不斷的損害，即使爲一教外人所主持亦難以忍受，何況乃出諸孕育於宗教職業中的人，反戈相向，無怪要倍增他們底痛恨了。這一點加重了他們的罪孽，因爲這似乎是在侮辱之上還加上一層叛逆之罪。這不是外來的戰鬥，乃是內部的背義。這是輕蔑主教統治制的一個主教，侮辱教會的

一個教皇內閣閣員(註三三)。但一般人底傾向如此，使教士不敢公開攻擊；但他們利用黨人，分佈可惡的誹言來損害這個偉大的大臣。他們說他是不貞的，他曾犯公開淫佚之罪，他曾和他自己的姪女發生曖昧(註三四)。他們宣佈他沒有宗教；他不過是名義上的舊教徒；他是呼格諾教派底教長；他是無神論者底主腦；更甚者他們控他擬建立分派於法國教會中。尙幸國人思想能爲這種詭計所蒙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這種種的告發仍值得紀錄，以其能表明當時一般情勢之趨向及宗教階級眼見其權力之羈纏由其手中脫落之痛恨。這一切事情都是這樣地昭彰，因此在最後一次反對黎塞留的內戰中——距他去世前二年——謀叛者在他們底宣言中，明白說出他們其中一目的，乃在恢復教士及貴族以前所享受的尊敬。

我們愈研究黎塞留一生的事業，則此種敵對行爲愈爲明顯。每件事證明他知道在舊的宗教的政府政策及新的現世的政策之間正進行着一大鬥爭；他是決定消滅舊的方策而維持新的一種。我們非但在內政上，且在外交政策上亦找到他對於神學事業之空前的輕視。奧地利家(House of Austria)尤其是它西班牙底一系，久已爲所有虔誠的人及教會之忠實同盟所敬重；它被視爲異教底打擊；它反異教徒的行動曾爲它在教會史中爭得盛名(註三五)。故當法國政府在查理士九世朝代時深思熟慮地預備毀滅新教徒時，法國即自然與西班牙及羅馬建立密切的關係；這三個強國非但是以政治上的利害之相關切來堅固地結合着，且憑着宗教契合之力量相維持的。這個神學上的聯盟後來被亨利四世個人及時代之增長的淡漠所破壞；但在路易十三未成年時，攝政母后曾當心地恢復這個聯盟而又曾設法恢復該聯盟持爲根據之迷信的偏見。以她全部感覺而言，她是個熱心的舊教徒；她很熱烈地依附西班牙；她又很得計地使他兒子——少君——和西班牙公主結婚而將她底女兒配於西班牙皇子(註三六)。

一般希冀，當黎塞留——羅馬教會底大主教——主政時，必將重新建立他所屬的宗教所切盼的關係(註三七)。但他底行爲却不被這些見解所支配，他底目的不在偏袒一教派底意見，乃在促進國家底事業。他底條約，外交及與國外聯盟政策等都不是着力於反對教會底敵人，乃在反對法國底敵人。以此爲新的活動標準，黎塞留

採取極大的步驟使歐洲政治學底全部系統成爲現世化。因如此他乃將人類底神學事業附屬於他們實際的事業裏。在他以前，法國底統治者因欲懲罰其信仰新教之人民，曾不惜懇求西班牙舊教軍隊底幫助；他們祇按舊的意見行事，以爲政府主要之責任乃在抑止異教。這種惡毒的主義第一次就被黎塞留公開地否認。在一六一七年他還未獲權的時候，他曾在給與一個外交官吏的訓令——現在還存在——中立下一原則，以爲在國事中，沒有一個舊教徒應偏好一西班牙人過於法國新教徒。在社會進步中，此種認國家之權利超於我人信條之上的意見，在我們看來固屬當然的事情；但在當時却是一件驚人的奇事（註三八）。但黎塞留並不畏懼地盡量將此矛盾之論推展至廣泛的範圍。舊教教會正直地認它底利益是和奧地利家相繫結的；但黎塞留在被邀赴會議時，即決定屈辱奧地利家底兩系。爲要達此目的，他公開地擁護他自己宗教底最劇烈的敵人。他襄助路德教徒反對德皇；他幫助喀爾文教徒反對西班牙王。在他秉政十八年中，他積極推進這正當的政策。當菲力潑（Philip）圖謀壓迫荷蘭新教徒時，他就和他們連合；最初供給他們大量的金錢，後又勸誘法王與那些教會認爲他應以反叛的異教徒來懲罰的人簽訂一密切聯盟的條約（註三九）。同樣的，當德皇企圖將德國新教徒之良心克服於舊教徒信仰時，黎塞留出任爲他們底保護者；他開始就謀圖拯救他們底領袖巴拉泰恩（Palatine）（註四〇）；因爲沒有達到目的，他就主張他們和考斯道夫·阿多夫（Gustavus Adolphus）。——宗教改革者所產生的最有能力的軍事領袖——聯合，他猶以爲未足。考斯道夫死後，他見新教徒失去了他們偉大的領袖，於是更努力地衛護他們。他爲他們而在各國朝廷中私訂通約；他爲他們而與各國磋商；結果他爲保護他們起見，組織了一公共的同盟會反對宗教上所有的考慮。這個開歐洲國際政體之重要先例的聯盟，非但是黎塞留和他自己宗教底兩個最有權力的敵人所組合，且爲西思蒙第（Sismondi）從該聯盟的宗旨着想有力地稱爲「新教徒之聯合，」——他說是法、英、荷三國新教徒之聯合。

單是這些事情將使黎塞留底主政成爲歐洲文化史中之一偉大時期。因爲他底政治開了一個著名信仰舊教的政治家有系統地輕視宗教利益而於內政外交上之全部計劃中表示這種漠視的先例。固然在較早一時期，於意大利